

品机构——华中宏济善堂研究》一文中认为是12300箱，而本书作者则通过对日本学者江口圭一《日中鸦片战争》原文资料的分析，认为输入总量应为4400箱。这些例子不但综合利用了各种相关资料，还对所用资料进行了精审的分析和辨别。

四 研究中的缺失

该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。首先，主次比例失衡。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日本侵华毒品政策，虽然各章节也论述了日本在中国各地的毒品政策，但关于纵毒、贩毒、禁毒等史实部分却占用了大量笔墨，从而显得主次关系失当。例如，“丧失人性的贩毒者”、“为虎作伥的朝鲜贩毒者”、“日军占领以前的华中禁毒运动”、“席卷长江下游城市的青年学生抗议运动”、“鸦片大王叶清和的罪恶一生”等小节。这些具体的史实对更好的理解日本毒化中国的历史是有用的，但对于研究日本对华实施的毒化政策却关系不大。其次，横向概括不够。本书以地域划分来研究日本侵华毒品政策，虽然便于全面系统地对问题进行考察，但难免造成体例上的条块分割。作者通过“台湾的鸦片专卖制度”、“傀儡政权满洲国的《鸦片法》”、“1940年的蒙疆鸦片政策”、“日本使馆与‘对华北地区鸦片与毒品方针’的提出”、“华中宏济善堂的纵毒新措施：种植与采办”、“厦门鸦片的大盘、中盘与小盘”6个小节，分别论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占领区不同的毒品政策，对各地毒品政策的内在联系也进行了一定分析，但仅仅将其归纳为“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机关犯罪”，就显得有些简单。因为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的毒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，而是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，只有分析各地毒品政策的异同关系，才能从整体上把握日本侵华毒品政策。再次，纵向分析不强。日本在华实施毒品政策的时间断限不尽相同，本书将整体的时间断限定为1895年至1945年，如日本对台湾的鸦片“渐禁”政策（1895—1945年）；日本对伪满洲国的鸦片统制（1931—1945年）；蒙疆鸦片生产基地与专卖制度（1935—1945年）；日本对华北的鸦片统制（1935—1945年）；华中宏济善堂的贩毒活动（1937—1945年）；日本在华南地区的纵毒活动（1938—1945年）。不难看出，日本对华毒品政策的发展演变，是伴随着日军逐步扩大对中国领土的不断侵占而来的。本书虽然从不同时段探讨了日本在各占领区的毒品政策，却未能对日本对华毒品政策纵向的演变轨迹进行理论概括。

（作者董文武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；张文涛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）

（责任编辑：徐志民）

“历史记忆与历史认识：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批判”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

2008年12月19—20日，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支援下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举办了“历史记忆与历史认识：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批判”国际学术讨论会。《抗日战争研究》执行主编荣维木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，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宋成有、徐勇、王新生、臧运祜等6名中国学者，以及朝鲜社会科学院高正雄等6名研究员和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李薰等6名研究委员发表了论文。北京大学教授沈仁安、王晓秋、李寒梅，以及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汤重南、延边大学教授朴灿奎、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柴璠等参加了评论。

本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是针对日本将于2009年进行新一轮历史教科书审定的现实而召开的。中、朝、韩三方学者着重考察了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沿革，分析了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、美化侵略的事实与根源。大家一致希望日本本着“以史为鉴，面向未来”的原则，以正确的历史教育下一代，共创东北亚和平共存、合作共赢的光明未来。（王元周）